

“上海方舟”：二战中的逃亡与拯救

陈 俭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

80多年前，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对急需庇护的犹太人关上了大门，但中国人民，特别是上海这座城市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向欧洲犹太人敞开了大门。上海人民以自己的包容和善良给予了犹太难民无私的救助，从1938年到1941年，大约2万名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难民远涉重洋来到上海，他们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有的直接投身于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历经浩劫，在患难中结成的友谊也让我们看到了战争悲剧中闪耀着人性璀璨的光辉，书写下反法西斯战争史上难忘的篇章。

一、风雨飘摇中的“上海方舟”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开始实施一系列反犹政策，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并逐步升级为暴力驱逐和大规模屠杀。1938年的“水晶之夜”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进入新阶段，迫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离开德国和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国家。然而，当时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在内的国家对犹太难民设置了严苛的移民限制，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安全的避难所。在这样的背景下，前往中国上海让走投无路的欧洲犹太人看到了逃脱纳粹魔掌的希望。

想要离开欧洲必须拿到签证，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1938年至1940年在任）及其同事周其庠，深悯犹太人遭遇，他们顶住巨大压力，毅然向寻求离境的犹太人大量签发赴上海的签证。此义举使约2000名犹太人得以逃生，犹太难民来到上海或辗转到达其他地方。何凤山颁发的签证被后人称为“生命签证”，彰显了危难时刻的勇气与担当。

欧洲犹太难民前往上海的路线因战争变化和个人情况而异，主要分为海路

和陆路。来自德国、奥地利和波兰的犹太难民首先抵达意大利热那亚或法国马赛，再乘船经苏伊士运河、印度洋抵达上海。少数难民搭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到达中国东北，然后南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并封锁主要航线，后续难民难以抵达。

据《以色列信使报》1941年2月21日援引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1940年年报》数据，截至1940年，该委员会登记的犹太难民已达23310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居住在虹口，主要因该区域物价和房租相对低廉，且已存在犹太人的社群基础。

二、艰难岁月里的守望相助

初抵上海的犹太难民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语言文化隔阂、经济困顿使许多人初期只能依赖救济组织。尽管生活艰辛，犹太难民凭借自身专业技能（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各种手艺人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积极重建生活，开设了服装店、咖啡馆、面包房等，迅速融入异国环境。在犹太人集中居住的提篮桥地区，尤其是舟山路、霍山路一带，商业繁荣，被誉为“小维也纳”。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远道而来的犹太难民展现了深切的人道关怀，伸出了援助之手。1933年5月13日，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亲赴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递交抗议书，强烈谴责纳粹暴行。“水晶之夜”后，《新华日报》《申报》《新闻报》等主流报刊纷纷发文抗议法西斯的野蛮行径，声援被压迫的犹太民族。

即便是在极为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上海人民用友善和包容庇护着犹太难民。提篮桥地区的上海市民腾出住房接纳犹太邻居，当地医院里还收治了许多犹太病患。1945年美军误炸了虹口区，造成31名犹太人死亡，250人受伤，周边的中国邻居同样伤亡惨重，但他们还是奋不顾身救出了很多犹太难民。上海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却提供了远离纳粹屠杀的安全港湾，使犹太难民获得喘息与安宁。

然而，黑暗并未远离。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发布了《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强制约1.4万名犹太难民迁入虹口“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限制自由出入。隔离区内拥挤不堪、疾病蔓延，犹太难民的生活雪上加霜。原犹太难民杰瑞·摩西在多年后重返上海时深情回忆：“如果这里的普通百姓不是这么宽容，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是悲惨的。在欧洲，逃难的犹太

人必须躲藏。然而在上海，我们可以跳舞，可以祈祷，还可以做生意……那些伴随我成长的中国人，永远是我眼中的英雄。善良、理解与宽容令中国如此伟大，这是战争、贪婪与仇恨永远无法企及的。我心中永远铭记着那些与我共度岁月的中国人，他们的处境可能比我还惨，却仍会为我感到难过。”这段肺腑之言深刻诠释了患难真情。

2012年10月11日，原犹太难民彼得·麦克斯召开了一场特殊的发布会，寻找自己的“上海阿妈”。“她只比我大几岁，就像我的姐姐一样，她是我的艺术启蒙老师。”1948年，10岁的彼得·麦克斯跟随父母离开上海，几经辗转最终定居美国，后来，他成为美国有名的波普艺术家。怀着对中国的感激之情，这位老人带着记忆中的画像回到上海，希望通过媒体能够找到“上海阿妈”，并将她接到美国。虽因信息缺失未能寻得恩人，但上海在其心中已烙下永恒的印记：“我去过很多国家，无论身在何处，我都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我认为自己百分之八十是中国人。”彼得·麦克斯的经历是众多犹太难民对上海深厚情感的一个缩影。

三、离别远行，心系“故乡”

二战结束后，怀着对上海和中国人民的无限感激，犹太难民陆续启程，踏上与亲人团聚或重建家园的道路。1946年至1951年，约22000—24000名欧洲犹太难民及其他在沪犹太人离开上海。尽管他们离开了上海，但并没有忘记避难上海的岁月和深厚情谊。直至今日，仍然有原难民及其后代重返虹口寻访故地。对他们来说，上海这座城市是庇护犹太人的“诺亚方舟”，已经成为他们永恒的第二故乡。

为了铭记这段珍贵的历史，2007年，经修缮的摩西会堂旧址作为纪念馆核心部分对外开放，标志着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正式成立。散居在全球的原上海犹太难民建立了联谊组织，如总部设立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前中国居民协会”（成员70%来自上海）、洛杉矶的“上海联谊会”、线上组织“黄包车联谊会”等。中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以建交后，越来越多的原上海犹太难民重返上海“故乡”寻根、访友、参观、旅游。

1979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迈克尔·布鲁门萨尔在华访问期间专程来虹口寻访旧居，与当年邻居共忆难忘的岁月。他曾感慨于上海的巨变并多次重返虹口，每次他都会参观纪念馆并前往舟山路59号探访自己住过的老房子，当回忆起全家4口居住在10平方米亭子间里的艰难情景，总忍不住热泪盈眶。

2019年2月21日，原犹太难民科特·威克偕家人重返上海。当他在纪念馆“名单墙”上找到自己和家人的名字时非常激动：“对，这就是我，这是我原来的姓氏。”在工作人员陪同下，科特找到了曾经就读的嘉道理学校旧址，还去了当时居住的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爱尔考克路（今安国路）一带。得知纪念馆将扩建并建立一座图书馆时，科特慨然表示愿捐赠自己珍藏一生的犹太历史文化书籍。当8000余本图书历经周折安全运抵上海后，远在伦敦的Kurt哽咽了：“很高兴这些书能回到上海，只可惜我父母看不到了，如果他们知道我把这些书捐赠给了上海，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感谢上海，感谢救了我们……”

四、以史为鉴、珍爱和平

这段展现中国人民大爱的历史，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赞誉，特别是犹太民族的感激。纪念馆至今已接待全球135个国家和地区的逾150万人次访客。络绎不绝的海外宾客，不仅是对历史的追寻，更是对纪念馆所弘扬的和平、包容、互助价值的深切认同。

以色列前总统哈伊姆·赫尔佐格是中以建交后第一位访华的以色列总统，在参观摩西会堂旧址时表示：“中国人民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帮助我们，以色列人民对此不会忘记。”美国犹太社团领袖来访时感叹：“辛德勒名单拯救了千余人，而上海拯救了整个犹太社群数万人。”

学界对此段历史的意义有深刻洞见。上海市党史学会原会长唐培吉指出：当西方文明国家在难民问题上空谈人道却行动乏力时，是上海伸出了温暖之手，与犹太难民共渡时艰直至战争胜利。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会长张云强调：上海接纳犹太难民是正义之举，凸显了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独特地位，深刻印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

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周汉民表示，纪念馆讲述的这段历史对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的意义。要推进中外艺术家合作，让纪念馆从历史的悲伤变为未来的昂扬，让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心中充满阳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杨洁勉认为，纪念馆的意义在于凝聚珍爱和平的共识，当前世界处于“和平与战争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全力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承担起守护和平的使命。

结 语

犹太难民避难上海的历史，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篇章。它始于纳粹的种族迫害，历经日本侵占上海的动荡，最终汇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洪流。自2011年起，纪念馆组织的“犹太难民与上海”主题展览赴德国、以色列、美国、匈牙利、澳大利亚、瑞士、意大利等国巡展，反响热烈。纪念馆的核心使命在于铭记这段特殊历史，填补二战叙事中“东方拯救故事”的空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深刻的历史注脚。这段跨越国界与民族的人道主义光辉，如同漫漫长夜中的一束火炬，不仅照亮过往，更将指引人类携手迈向和平、包容、共荣的未来。